



唐五代

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

严正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五代

严正道◎著

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严正道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61-8644-2

I. ①唐… II. ①严… III. ①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唐代②诗歌—文学研究—中国—五代十国时期③巴蜀文化—研究 IV. ①I207.22②K8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494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唐五代入蜀诗概述 / 9

第一节 唐五代入蜀诗之界定 / 9

第二节 唐五代入蜀诗的时段分布特点 / 13

第三节 唐五代入蜀诗的地域分布特点 / 38

第二章 唐前入蜀文士与文学 / 55

第一节 先秦入蜀文士与神话传说 / 55

第二节 两汉入蜀文士与巴蜀文学的初兴 / 63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入蜀文士与文学 / 74

第三章 唐五代诗人入蜀动因 / 96

第一节 前提条件：交通条件的改善 / 96

第二节 政治影响：宦游与避乱 / 106

第三节 文化吸引：游历与观景 / 116

第四节 个人需求：入幕与应举 / 126

第四章 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自然山水 / 138

第一节 北线陆路通道山水 / 140

第二节 东线峡路通道沿线山水 / 149

第三节 成都及其周边山水 / 160

第四节 入蜀诗人笔下的巴蜀山水印象 / 171

第五章 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方物 / 185

第一节 子规 / 185

第二节 啼猿 / 188

第三节 海棠 / 192

第四节 荔枝 / 196

第五节 蜀茶 / 202

第六章 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民情风俗 / 208

第一节 游乐习俗 / 208

第二节 土风民情 / 217

第三节 僚人风俗 / 230

余 论 / 239

附录一 唐五代入蜀诗人名录 / 244

附录二 唐五代入蜀诗篇目 / 274

主要参考文献 / 302

绪 论

众所周知，文学活动作为人类一种高级形态的有意识行为，总是产生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因而文学表现的内容与形式，体现的风格与特征，也总是与其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这种地域文化色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地域风格，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地域广袤辽阔，各地之间无论山川水土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是语言、风俗、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人文地理环境，往往迥异。文学创作的地域风格也就显而易见了”^①。古人对于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早有认识，如《左传》二十九年所记载的一段吴公子季札对《诗经》若干篇章的解读，已经具有很浓厚的地域文化意识。大概是受到季札这种以地域论《诗》的影响，班固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论述各地不同的风俗民情时，也常常结合《诗经·国风》中的篇章加以阐释。如论陈地，“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②。又论齐地，“临甯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虞岷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体也。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

① 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第50页。

② （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53页。

可量也。”^①班固从《诗经》的篇章中管窥各地的风俗人情，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对诗歌与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受此启发，后世的一些《诗经》研究著作，如朱右曾的《诗地理征》、桂文灿的《毛诗释地》、尹继美的《诗地理考略》等，专作地理考释，“尤详于地理，凡古今之沿革，政教之得失，风俗之贞淫，皆三致意焉”^②。

与《诗经》相比，楚辞的地域文化色彩更为鲜明。刘勰《文心雕龙》卷十《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③说明屈原的诗歌受楚地自然山川风物的感发，如有江山之助，才能自成一体。而宋人黄伯思对楚辞的定义，更直接明确地指出了楚辞与楚地独特文化之间的关系，“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④。

对《诗经》《楚辞》与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这些论述，反映了古人试图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探讨诗歌的内在意蕴与发展规律，以期准确把握诗歌，作出更为合理的阐释。而随着人们对文学本身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自然地理知识的不断丰富与地域文化认知的深入，以地域论文学就成为古代文学批评家常用的一种方式。如曹丕《典论·论文》评“七子”之一的徐干时说“时有齐气”^⑤，殷璠《河岳英灵集》认为崔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⑥。计有功《唐诗纪事》谓张说贬官岳州，“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⑦。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虽然论说简短，却真实反映了文学受地域文化影响之

① (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59页。

② 尹继美：《诗地理考略题词》，《续修四库全书》(第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③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卷十《物色四十六》，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4页。

④ (宋)黄伯思：《新校楚辞序》，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九十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06页。

⑤ 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⑥ 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1页。

⑦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四，王仲镛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4页。

事实。而这其中最为论文学者注意的是《隋书·文学传序》的一段评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①这也是古代文学史上以地域划分文学流派的肇始。自宋出现以地域命名的江西诗派后，明、清两代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便不断出现，如公安派、竟陵派、吴中派、闽中派、铜陵派、常州派、浙派等。以地域命名文学流派，反映的正是他们受共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形成大致相同的审美情趣、文学主张、风格特征等。

以上是古人对文学与地域文化关系认识的概述。显然古人的这种认知多是一种体悟式的论述，还不能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主张。近代以来，以对南北文学的不同讨论开始，不断细化，逐渐形成以不同文化区域，甚至更为细致的子文化区域的文学研究。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是较早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其在《隋书·文学传序》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南北文学不同的原因：一是音声不同，“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二是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民俗文化的差异，造成南北文学的不同，“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刘氏之论，虽承续的是传统的南北文学二分法，但已注意到地域文化对文人的特殊影响，如在谈及柳宗元与韩愈时，他认为：“子厚与昌黎齐名，然栖身湘粤，偶有所作，咸则《庄》《骚》，谓非土地使然欤？”^②王国维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对屈原文学精神形成的历史文化环境，从南北文化的不同作考察，认为屈原在体现南方富想象，于理想中求安慰的特征的同时，也受到北方重情感精神、坚韧刚毅的文化影响^③。之后的一些学者也陆续有

① （唐）魏徵：《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②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224页。

③ 参见《王国维集》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0页。

所论述，如牟润孙、唐长孺、程千帆等。值得注意的是程千帆先生的观点，他在肯定中国文学分南北二种的同时，又认为中国文学“虽分南北为二种，然此仅就其大较言之，若细加区分，则南北二种之中，又各有其殊异”。并且认为“文学中方輿色彩，细析之，犹有先天后天之异。所谓先天者，即班氏之所谓风，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谓后天者，即班氏之所谓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为其根本，后者尤多蕃变，盖虽山川风气为其大齐，而政教习俗时有熏染；山川终古若是，而政教与日俱新也”。“且地理区分，于文学之发展，固不失为重要之因素，然实非决定性之条件。”^① 程千帆先生的观点突破了自古以来人们对中国文学简单固定的划分方法，不但强调南北文学各自同中之异，不能一概而论，亦突出政教习俗对文学的影响。

如果说上述诸人的探讨还主要停留在文化层面，那么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②一文则可以看作是在实践上真正将地域文化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始。该文将近代诗人以地域为依据分为六派，从他们所属不同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各自的诗歌特色，由此开启了地域文学研究的先河。不过，地域文学研究的全面兴起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1986年金克木先生发表了他的《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提出文艺的地域学研究可能有的四个方面：一是分布，“地域分布研究不是仅仅画出地图，作描述性的资料性的排列，而是以此为基础提出问题”。二是轨迹，“可以是考察文学家、艺术家和作品及文体、风格的流传道路”。三是定点，“可以是考察一时期或长时期内一个文学艺术流派的集中发展地点，也可以是其他的点”。四是播散，“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尚不明白全国传播轨迹的风格、流派及其他”。^③ 这篇文章在指出地域文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地域文学研究的进展，尤以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推动最为明显。比较有影响的成果如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④，余恕诚《地域、民族和唐

① 程千帆：《文论十笺》，《程千帆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21页。

② 参见《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③ 参见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④ 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诗刚健的特质》^①，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②，尚定《关陇文化与贞观诗文》^③，杜晓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④，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⑤《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⑥，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⑦，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⑧，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⑨，等等，可谓成果丰硕。

回顾上述唐代地域文学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研究者的关注和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关中、吴越这两个区域，这当然与这两个区域是唐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文学发达有关，然而其他区域，如巴蜀地区，它对唐代文学的繁荣和兴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戴伟华先生对唐诗创作地点所作的统计。以现行行政区域划分，在能够明确确定创作地点的全唐诗中，数量最多的是陕西，为4647首，其次是河南，为1588首，再次是江苏，为1564首，第四则是四川（包括重庆），为1470首，多于浙江的1374首^⑩，在唐前巴蜀文学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其异军突起的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者注意。这是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而从对唐诗的影响上来看，其在唐诗变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如初唐四杰，对初唐诗风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把诗歌从宫廷转向市井，从台阁移向江山和边塞，而促使他们的诗风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入蜀的经历。正如尚定先生所言：“如此重视王勃在巴蜀时期的创作，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四杰中的另外三人都曾经游过巴蜀，巴蜀生活在他们的创作生涯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甚至无例外地用分析王勃的方法来分析这些诗人在入蜀前后的变化，可以说，他们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与漫游巴蜀直接

① 参见《安徽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

② 参见《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170页。

③ 参见《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

④ 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⑤ 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

⑥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⑦ 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⑧ 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⑨ 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⑩ 参见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页。

相关。”^①又陈子昂、李白、杜甫、刘禹锡等人，不管是出蜀还是入蜀，巴蜀文化对他们的诗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或奠定他们诗歌的主要风格，或带来他们创作上的深刻变化。可以说唐诗转变的几个重要时期都或多或少与巴蜀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因此，研究唐代地域文学，巴蜀地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如此，才能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唐诗的发展变化有更为清晰、准确和全面的认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巴蜀地域文化对唐诗的影响存在两种情况。按照一般规律，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作家、作品来实现，这里就存在“先天”和“后天”的问题。“先天”是指作家从一开始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没有受到外来的压力而自觉接受其熏陶，长期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以至在后来的文学活动中处处体现出这种文化的身影，进而又以自己所属文化去影响整个文学，如陈子昂、李白，他们对唐诗的影响主要是在出蜀以后。所谓“后天”，是指作家原本属于另一个文化区域，而由于外在的原因，被迫接受另一种文化，结果在文学创作上出现内容和风格的新变化，如初唐四杰、杜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而这些新变化都是在入蜀以后发生。本书所要研究的是后一种文化现象以及对唐五代文学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从巴蜀文学的发展进程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来看，唐五代时期的巴蜀文学还处在恢复和重建期，本土文学家特别是诗人数量并不多，据杨世明所著《巴蜀文学史》统计，巴蜀籍文学家除陈子昂、李白两位大诗人外，还有苑咸、刘湾、苏涣、马逢、符载、仲子陵、雍裕之、李馀、李远、雍陶、姚鹄、罗衮、唐求、黄崇嘏、花蕊夫人、辛夤逊^②，共 18 位诗人。而此时期至今还留存有入蜀诗歌的其他地区入蜀诗人却多达 196 位（具体可见附录一），为本土籍诗人的十余倍，如果加上其他入蜀诗歌已失传的诗人则数量更多。可以说，对唐五代时期的巴蜀文学起推动作用的主要还是入蜀文人，并为两宋巴蜀文化与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以入蜀诗人

① 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4 页。

② 参见杨世明《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 2003 年版，第 192 页。

为特定对象，通过他们入蜀后诗歌创作与风格的变化来考察巴蜀地域文化对唐五代诗歌的影响，对于认识唐诗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寻绎唐诗及巴蜀文学演变发展的文化原因皆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唐五代诗人入蜀后诗歌创作受巴蜀文化的影响而出现变化这种现象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如夏承焘《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①一文，以及王平《杜甫与巴渝歌谣》^②，都指出杜甫在蜀中时所作诗歌受到蜀中民歌的影响。但在地域文学研究兴起之前，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地域文学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唐代诗歌与巴蜀文化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首先是一批唐五代诗人入蜀经历考证成果的出现，如 1993 年王瑛的《杜光庭入蜀时间小考》，1995 年黄震云的《李贺入蜀为宰考》，1999 年王辉斌的《孟浩然入蜀新考》，2001 年田道英的《贯休蜀中诗作系年考证》，2002 年张海的《贯休入蜀考论》，2006 年吴明贤的《苏颋入蜀考》，等等。而综合了上述成果的是 2009 年张仲裁的博士论文《唐五代文学家入蜀考论》，利用前人丰富的考证成果，比较全面清晰地整理了入蜀文人的主要入蜀行踪与事迹，基本勾勒出唐五代时期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又从历史和人文地理的角度，深入分析文人入蜀的原因及其特点。尤其是他的《唐五代文人入蜀编年史稿》，“勾画出唐五代文人这一波澜壮阔的文学史全景”^③。在考证清楚唐五代入蜀诗人的入蜀事实基础上，探究他们入蜀后诗歌创作与巴蜀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些成果也陆续出现。整体性论述的有杨世明《巴蜀文学史》、谭兴国《巴蜀文学史稿》、王定璋《入蜀诗人撷英》等，把唐五代入蜀诗人作为巴蜀文学的一部分作了介绍，但偏重于史的一般性论述，较少从文化方面着眼。而入蜀诗人个案研究成果则不断出现，如黄奕珍的硕士学位论文《杜甫自秦入蜀诗歌析评》、曹仲芯宁的硕士论文《韦庄入蜀及其蜀中诗歌研究》、柯璐的硕士学位论文《李商

① 参见《文学评论》1962 年第 3 期。

② 参见《重庆日报》1962 年 4 月 15 日。

③ 邓小军：《唐五代文人入蜀编年史稿序》，张仲裁《唐五代文人入蜀编年史稿》，巴蜀书社 2011 年版，第 1 页。

隐入蜀及蜀中文学创作研究》、郑枚梅的硕士学位论文《元稹入蜀和蜀中诗歌创作考论》等，对于入蜀诗创作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诗人作了专题研究。其研究内容则主要是通过这些诗人入蜀后文学（主要是诗歌）创作的变化，探讨巴蜀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但缺少深入分析，浅尝辄止。也有分段研究，如林静的博士学位论文《初唐文人入蜀现象与诗歌关系研究》、梁谋燕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唐文人入蜀研究——以入蜀文人在蜀所作诗歌为考察对象》、高静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唐末至后梁由北入蜀文人心态及其创作——以诗歌为中心》，分别对初唐、中唐、晚唐五代入蜀诗人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重要诗人以及一般诗人皆有兼顾，重点是分析其入蜀后诗歌创作的变化，以及与唐诗发展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林静之文，重点考察入蜀诗人巴蜀地区游历的经验对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创作与初唐诗歌整体进程之间呈现的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个案研究与宏观审视相结合，对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唐诗的发展演变具有积极意义。

从以上研究成果看，学界对于入蜀文人入蜀事迹与入蜀诗文的考证已经很完备，笔者只需作补充完善即可，但对于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入蜀诗对于整个唐诗演进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确切的论述。即使是个别诗人的入蜀诗创作，如高适、岑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商隐、贾岛等，受到巴蜀地域文化怎样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积极接受巴蜀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是如何改变巴蜀的文化生态，为巴蜀文学的复兴奠定基础，这些在已有的相关成果中或者没有涉及，或者停留于一般化论述，或只是因人论事，缺少整体关照。有鉴于此，本书力图把唐五代入蜀诗作为一个整体，从巴蜀文化的角度切入，在唐诗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通过深入细致的个案作家分析，从文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探讨唐五代入蜀诗发展演变中的文化因素，拓宽巴蜀文学研究的视域与空间。

第一章 唐五代入蜀诗概述

第一节 唐五代入蜀诗之界定

关于什么是入蜀诗，由于对“入蜀”一词理解不同，因而研究者存在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把“入蜀”理解为一个过程，而把诗人在这个过程中创作的诗歌都称为入蜀诗，如马晓光言：“自秦州至成都路上，杜甫有感于山川形胜，写下了31首山水行旅诗。……这组山水行旅诗可以称为入蜀诗。”^①吕肖焕论曰：“《入蜀记》客观、冷静记录了绍兴到夔州一路山川、习俗、人物、文化，展现的是陆游理性、好学、深思、好交游的形象，基本上没有流露陆游对此次宦游的不满情绪；而入蜀诗特别是进入夷陵以前的诗，则与该时期的日记截然不同，呈现出的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陆游形象，诗中充满悲伤、无奈、怨恨等消极情绪。”^②两者皆把诗人入蜀过程中，包括入蜀前和入蜀后的诗歌称为入蜀诗。另一种说法是仅把“入蜀”理解为进入巴蜀之地，而把诗人进入巴蜀之地后创作的诗歌称为入蜀诗，如张仲裁的博士论文《唐五代文学家入蜀考论》从“自古诗人皆入蜀”这一说法从源流考察入手，对“蜀”这一概念的地理与文化特征作了简明概括，实际上界定了入蜀文学作品的范围是在进入蜀地之后，而不包

① 马晓光：《论杜甫入蜀诗对山水诗的贡献》，《山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70页。

② 吕肖焕：《陆游双面形象及其诗文观念之复杂性——陆游入蜀诗与〈入蜀记〉对比解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括入蜀过程中的文学作品。伍联群的博士论文《北宋文人人蜀诗研究》也是先对北宋“蜀”的地理范围作了明确界定，以此确定北宋入蜀诗的概念。^①最近的一些硕士、博士论文也大都采用这种说法。^②这两种说法，都是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入蜀诗所作的自我界定，本身并无对错优劣之分，但若从地域文化与诗歌的关系角度考虑，后者则更为明确，指向性也极为清楚，对于考察和研究巴蜀地域文化与唐诗的互动关系更具有实际意义。因此，本书所指入蜀诗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即指外籍诗人入蜀后创作的诗歌，而时间则限定在唐五代。另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清楚：一是何谓“外籍诗人”；二是如何确定外籍诗人入蜀后的诗歌。

所谓“外籍诗人”，是指祖籍、出生地及其主要成长环境都不在巴蜀地区的诗人。之所以强调“主要成长环境”，是因为像李白、薛涛这样的诗人，祖籍、出生地虽都不在巴蜀，但他们从幼年起就生活于巴蜀，浸润于巴蜀文化中，受巴蜀文化影响极深，实质上与其他巴蜀诗人并无二致，因此本书不把他们看成是外籍诗人。至于如何确定外籍诗人入蜀后的诗歌，首先需要确定的就是“蜀”的地域范围。“蜀”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一开始就和“巴”连在一起，尽管两者最初互不统属，但因其地缘关系，相似的地理环境与生活习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与影响，逐渐融会一致，形成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的独立区域。相对于中原等区域而言，巴蜀的共同文化特征如此明显，以致人们习惯于将巴蜀并称，而不需要作刻意的划分（实际上也很难区别清楚），甚至巴蜀合一，以蜀统巴，单称“蜀”。虽然在元代以前，巴蜀并没有在历朝历代的行政区划中真正合一过，但不管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在他们的意识中，巴蜀实质就是一体，从扬雄《蜀都赋》，到陈寿《三国志》，再到著名的乐府诗题《蜀道难》，无不体现出以蜀统巴、巴蜀合一的意识。而“唐代以后，蜀不

① 参见伍联群《北宋文人人蜀诗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版。

② 如北京大学2013年林静的博士学位论文《初唐文人人蜀现象与诗歌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高静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唐末至后梁由北入蜀文人心态及其创作——以诗歌为中心》，扬州大学2012年梁谋燕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唐文人人蜀研究——以入蜀文人在蜀所作诗歌为考察对象》等。

再是行政区划之名，但川西乃至整个四川地区长期以蜀或蜀中作为代称。直到清末，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重庆所成立的新政权仍叫‘蜀军政府’”^①。由此可见，秦以后的“蜀”不能简单地只视作古蜀地，它实际上已约定俗成地成了人们对整个巴蜀大地的称呼。因此，所谓的“入蜀”，也就是指进入“巴蜀”之地。这也与唐诗中大量以入蜀命题的诗歌所指范围大致相同。

不过，正如上文所说，在元以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划能包含整个巴蜀地区，唐代更是如此。唐代有关巴蜀地区的行政区划几经变更，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全国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巴蜀地区分属剑南道、山南道、江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重分天下为十五道，巴蜀地区再被细分，剑南道保持不变，而嘉陵江以东归属山南西道，忠州、万州、夔州归属山南东道，黔州归属黔中道；肃宗至德二年（757）剑南又分为东川、西川，更加细化。因此，若要根据唐代的行政区划来确定“蜀”的地理范围是非常复杂的。有鉴于此，本书拟借用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一书的以今之省区为划分依据方法，先将“蜀”的范围界定在今之四川、重庆之内，再比照唐代不同时期之行政区划，凡外籍诗人在上述地区创作的诗歌都可称之为入蜀诗。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以今之行政划分作为依据，范围明确，易于界定入蜀诗；二是因为四川、重庆自古以来就是巴蜀文化的核心地区，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特质，而其他一些边缘区域，如那些曾属于巴蜀地区而今已归属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的地区，虽受巴蜀文化影响，但又与其他文化联系紧密，体现出多重性，因而不在于本书所指“蜀”的范围内。因此，结合古今各种图志、地理书及研究著作，以下唐代诸州可以确定为在“蜀”的范围的有：益州（蜀郡、成都府）、汉州（德阳郡）、彭州（濛阳郡）、蜀州（唐安郡）、眉州（通义郡）、绵州（巴西郡）、剑州（始州、普安郡）、梓州（梓潼郡）、遂州（遂宁郡）、普州（安岳郡）、陵州（仁寿郡）、资州（资阳郡）、荣州（和义郡）、简州（阳安郡）、嘉州（犍为郡）、邛州（临邛郡）、

^① 袁庭栋：《巴蜀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